

1966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撷英

15

电白县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编

文史薈英

第十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电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刊名题字：吴南生（原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政协主席）

责任编辑：邓灌民

封面设计：谭文栋

图片摄影：区叔元

EA26/46

封面图片：石柱

石柱位于霞洞石顶，高 4.8 米，埋于地下部分约 2~3 米，柱围 2.7 米，直径 90 厘米，重约五六十吨。

（有关史料详见本辑第 28~32 页）

目 录

生活片断的回忆	叶 春 (1)
叶春与“中山剧社”	刘俊才 (10)

回忆录

电白县人民政府在电城成立	刘俊才 (13)
电白县人民政府迁驻水东	邓灌民 (15)
回忆水东东阳街地下站	邓文威 (16)
回忆粤桂边区青年干部训练班	邓文威 (19)

冼夫人研究

麦英豪先生考察山兜，谯国

夫人冼氏墓再次得到证实	梁成材 (20)
高力士传略	梁成材 (24)
石帆·石船——千古民族文化景观	梁成材 (28)
冼夫人娘家在山兜乡丁村	刘俊才 (33)
民国时期霞洞商会概况	王修俊 (34)
电城最早的汽车客运站	刘南枝 (35)
马踏的楼坑岭与百家坟	蔡兆荣 (37)

历史资料

从省、市与县的关联和比较

- 看电白县历史上的旱灾..... 李爵勋 (38)
- 壬申年电白旱灾见闻..... 刘文江 (45)
- 电白县籐竹开花结子史料拾零..... 李爵勋 (47)

烈士遗作

- 谢牛山下 李嘉 (48)

老同志旧作

- 瘟疫猛于虎..... 适如 (50)
- 一件寻常事..... 陈广杰 (52)
- 电白光明中的黑暗面..... 包子 (54)
- 电白参议会选举的舞弊..... 包子 (56)
- 风流校长
- 电白小学校长集训生活零碎 王丙乾 (57)
- 电城见闻两则..... 巴伯 (60)
- 仲夏电城..... 巴伯 (62)
- 滨海的麻茂
- 电白沿海乡村的剖面 克明 (64)
- 赌窟参观记..... 华波 (66)

生活片断的回忆

叶 春

叶春同志，是电白县电城镇湿水村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人民做过很大贡献。离休前，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业余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不幸辞世，享年 92 岁。现将其遗作刊登于此，以表悼念。

电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04 年农历 9 月 2 日，我出生于电白县湿水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叶昌宇，由自耕农起家，蓄聚了一些田产，后来又经营商业，成为地主兼工商业者。但五十多岁即因病去世，他死时我才七岁。母亲是后母，大权掌在不同母的大哥手里，他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嫖赌饮吹四害俱全，不几年便把父亲遗留下来的浮财耗尽，开始借债度日。我读过几年私塾，后来考上新办的小学（旧制）。毕业后，大哥怕我和他争夺家产，不让我继续升学，要我在家乡帮工人种田，一待就是五年。母亲是农家女，不识字，无知识，她做人的哲学是忍耐，哥嫂把她当工人使唤，她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只能夜里闭门饮泣。我看着母亲经常以眼泪洗面，小小的心灵便种下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但在大哥的压力下，我也无可奈何！后来母亲终因忧郁成病而去世。当我正在悲痛欲绝的时候，我小学同学陈德宾、区伟蕃来看我。当时是国共合作，他们都是县党部的负责人。他们同情我的遭遇，劝我离开家乡，出

去工作，并和我说了许多革命大道理。我听了很高兴，答应出去跟他们工作。但不几天便发生清党事件，陈德宾被捕，区伟蕃逃亡，我幸而未成事实，未被牵连。但他们的谈话，在我思想上起了很大影响，我再不能在农村待下去了，终于偷偷离开家乡，考上县立一中读书。大哥再也不能阻止我了。这是1927年的事。

县立一中在电城，距离我的家乡八华里，是当时唯一的一间中学。校长李滋大，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思想比较开明。在学校里我拼命学习。学生中我是年龄最大、成绩最好的一个，很快便被推选为学生会负责人。三年中，我领导同学搞过两次风潮，一次是反对学校滥收杂费，一次是驱逐党义教师林某。由于同学们团结一致，两次都取得胜利。

清党后，县中领导人分为两派，一派以谢维屏为首，一派以杨竹轩为首。他们互相倾轧，斗争颇为剧烈。结果因谢维屏有古应芬为后台取得胜利。谢是同盟会员，把持县党部，兼任县长。谢为人清廉，但有名士派头，爱饮酒，终日醉昏昏，不理事，让手下一些人如吴廷松、邵振鏐、区天佑、谢镇干等，胡作非为，以致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直至姚之荣来当县长，开展剿匪运动，治安才稍为好转，但对地方建设是谈不上的。这是我在一中读书时的情况。

初中毕业后本无力升学。由于我的语文教师王炯声，是广州人，原是中大学生，因家贫中途停学来我县教书。他赞许我的语文作业，同情我的处境，劝我到广州升学，并说可住在他家，吃饭不用花钱，于是我跟他到了广州。恰好市立一中招生，校长司徒优是英美留学博士，教师多是有名学者，不收学费，连书籍也是公家供给，报考的人很多，我终于考上高中文科。我的班主任胡春冰，是有名的戏剧家。在他的指导下，我参加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各种学生活动。学校是新办的，没有校舍，只在越秀山麓搭了一些茅棚上课。

我是1930年秋入学，次年即遇到“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我东

三省。学生开展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我在县中读书时，很少接触新事物，思想很闭塞，什么都不懂。这时读了许多新书报，觉得很新鲜，于是如饥似渴地拼命阅读，加上参加学生活动，接触的人多，思想起了很大变化。

我住在王老师家里，吃饭虽不收钱，但看着他老母亲为人洗衣服维持家用，心里过意不去，总想设法赚些钱来补家用，于是我想到投稿。记得那年国庆日，因“九一八”国耻日，全国学校都不放假，我写了一篇小说《国庆日的晨课》，通过一个小学生的口，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对东三省沦陷的悲愤和爱国心情。我把这篇小说投寄给当时《国民日报》副刊《黄花》，居然刊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这给我很大的鼓励。以后我写了不少小说、诗歌、杂文，寄给各报刊。当时稿费很少，每千字只有三角钱，而稿寄出去不一定能刊出，刊出了有时也收不到稿费，因为我写的多是我熟悉的黑暗面，有些报刊不敢登，于是我和温流（梁惜芳）、李六石（张家耀）、周岱（周怀祖）等同学磋商，决定自己办刊物，自己筹印刷费，印好了拿到书店、报摊去寄卖。当时是陈济棠统治广东时代，对报刊控制颇严，我们的刊物往往出不上几期便被查禁，不得不另换刊名。我们出过的刊物有：《绿天》、《诗野》、《诗歌》、《诗歌生活》等。我们大家都用笔名，笔名也经常变换。我用的笔名有夏子、新绿、霍明、杜薇、叶小舟等。

为了减轻王老师的负担，我邀请一些同学来同住，共同分担房租和伙食费，如蔡守棠、区鲤腾、李卓然、还有些潮汕同学，让王伯母主持家务。她象母亲一样照顾我们，互相帮助，和睦，亲如家人。

高中毕业后，我和温流、李六石都考上中大，我读中文系，温流读教育系，李六石读社会系，周岱不升学，他回到海南家乡打游击，后壮烈牺牲。我们曾一起参加广州市文艺工作者协会（简称艺协）诗歌组，由温流任组长，开展新诗歌运动。在诗歌组我认识了陈残云、黄

宁婴、陈芦狄、韩彦、阳光（陈华）、雄子、何子等，后来他们多成了有名的作家。同时我还主编中大中文系出版的《文学生活》，与温流主编的《今日诗歌》互相支持和配合。与当时现代派诗人展开辩论。不幸1937年温流因鱼骨梗喉到医院治病，被庸医误打麻醉针逝世。此后，由黄宁婴代替温流任组长和主编《今日诗歌》，出了两期改为《广州诗坛》，后扩大为《中国诗坛》，影响遍及全国。

回想我失学五年虽是坏事，但也有好处。我曾利用工余读了不少旧书和小说，尤其是对唐诗很感兴趣，《唐诗三百首》，我能大半背诵，这对我写新诗颇有帮助。当时我们提倡新诗应反映现实，教育人们爱生活、爱祖国，我们反对写象征诗，认为那是逃避现实，把青年引入迷途，因而与现代派展开论战。同时我也不喜欢口号式新诗，我写新诗很重意境、词句和音韵节奏。记得有一年农历八月初一，县中刮了一次特大台风，博贺海港的渔民大都葬身鱼腹，只剩下孤儿寡妇，生活濒于绝境。恰好近海有一沉没商船，渔民潜入水底，把船上浸坏了的粮食，捞起来充饥，县官知道了，向他们勒索，得不到油水就诬害他们是“海盗”，把一些为首的父老逮捕，引起渔民的反抗。我曾亲到渔村去调查，写了一首长诗《海底歌》，由赖少其配上木刻，在《诗歌》上发表。现在诗稿已遗失，但其中一些词句我还记得。如描写渔村风灾后的情景有：

饥饿的阴影笼罩了全村，
蛛网已封闭了不少柴门；
寡妇含着酸泪修补破网，
一针针牵出渺茫的希望！

老人太息着神的处罚，
昏花的泪眼不敢正视今后的生活；

洪涛一次次飘来臃肿的尸身，
悲惨的哭声震动了老人的心弦。

此外，我还接近穷苦农民，与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困难。我写一篇小说《慧宝》就是以我家长工为模特儿的。我通过他的生活遭遇和死亡，反映出当时农村受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致破产的情况。

要写作，就必须深入生活。我受胡春冰老师的影响，利用戏剧宣传，尽量多做启蒙工作。我和县中一些留穗学生如高川若、区旭澍、杨学文等，组织宣传队，利用寒暑假回到县中宣传。电白是一个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县，一般人都把演戏看成下贱职业。要演好戏，就要懂得演戏的艺术。恰好当时欧阳予倩（戏剧家）在广州办戏剧训练班，我们决定派区旭澍、杨学文两人去参加学习，回来当导演；另方面我们要设法改变一些人的旧观念。为了找女演员，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当时谢维屏的女儿谢光帼，在电城创办了一间女子小学，我从女小找到两个女生香如兰、杨润珍，先得到她们本人同意，再与学校谈，学校同意了，但家长不同意，他们鄙视戏子，不愿意女儿抛头露面，怕将来找不到夫家。我亲自找他们反复谈心，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他们同意，让女儿参加我们的演出活动。因为我曾利用广州留学会办了一个刊物《电风》，在县中有点影响，我本人也有一点声望，相信我不会骗他们。

说到《电风》也有一段历史。原来广州电白留学会每年有一笔经费四百元白银，由县印金会拨支。过去由几个富家子弟垄断，把钱花掉，什么也不干，同学们很有意见。我们通过换届选举，把他们选掉，由我们接代。我们即利用这笔钱办了《电风》，由我当主编，除了介绍一些新思想信息外，还针对县中一些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和建议，取得县中一些青年的好感和合作，如王丙光、黎诚儒、刘俊才、张逸农、

赖斯美、黄天柱等，他们就是向《电风》投稿而与我们取得联系并参加我们剧社的。我们的剧社叫《中山剧社》，是经过县党部批准的，是合法的。

过去，电白是没演过话剧的，我们的演出是破天荒第一次。为了使观众容易理解，每出戏我们都将内容写成传单发给观众。为了争取一些老者同情，我用文言文写传单，用《聊斋》的笔法，简洁明了，取得老人的赞许。记得演出熊佛西的《屠户》时，当戏演到高潮时，观众忘记那是演戏，都站起来叫打，全场震动。事后有些台词还被观众传诵，从而看出戏剧宣传的重要。

我离开家乡出来读书时，大哥不给我费用，我自己借了些债。到了我大学二年级时，债主催债，我不得不停学去教书。恰好电白县在霞垌创办一间师范学校。校长崔规循来中大请教师，我应聘回去当了一年教师。当时中等学校教师待遇还不错，每月有七、八十元白银。我教了一年书不但还清债务，还支持两位穷朋友读书。复学后的一切费用，都是靠那一年的工资开支。

在师范学校我教语文、数学两门功课。根据我的经验，除教好书外，还着重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刊，鼓励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因此，我和学生的感情很好。这里有一个插曲：同事中有一位教英语的女教师，是本县沙院人，父亲在南洋经营橡胶园。她本来是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的，因橡胶业不景气，父亲没寄钱回来，迫得她停学去教书。她是华侨，从小就学英语，所以功课教得很好，发音很正确。教务主任王某也教英语，是土英语，发音不正，过去没有比较，学生不懂，这时一比，相形见拙。王某很苦恼，暗中指使几个学生反对女教师，搞风潮。学生把内幕告诉我，我感到不平。我找校长说：“我是主张学生择师的，但要听全体学生的意见，不能让几个学生说了算，应马上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让学生公开评议，如果学生认为我教得不好，我马上

走人。”校长怕学生真的起来评议，下不了台，急忙出来制止。王某怕露出马脚，不敢公开支持几个学生，终于把学潮压下去。女教师知道此事后对我有好感，学期结束时，她提出辞职，临走时赠我一首新诗：

乡村里，
才相逢；
而今又告别离。
且归去——
归去披上我的征衣。
再相逢，
何时何地？
问落花，
落花无语；
问白云，
白云摇首西飞。

此后，她在廉江、合浦等地教书。我们开始通信，假期回来也见过几次面，逐渐建立了感情。我家乡提倡早婚，我20岁时就由母亲作主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并有了儿女。我不能把个人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我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并介绍中大一个教授和她相识。那教授刚死了妻子，年纪也不大，教授对她很满意，但她不愿意，没有成功。

1937年我大学毕业。这时她父亲生意好转，她已不需再到处流浪了。她写信约我到她家里，说她父亲从南洋回来，想见我。我到了沙院她的家，见到她父亲。他说他这次回来，主要是解决女儿的婚事，希望我帮忙。但我有什么办法能帮他的忙呢？这时我已接了西江喜泉农校的聘书，我在她家住了一夜，便匆匆和她告别赶西江去了。

1938年上半年，我在电白一中教书，下半年参加张炎将军的抗日

工作，和她见过几次面，我劝她出来工作，但她很消沉，认为在家可以生活，何必到处奔波，自讨苦吃呢？

有一次，我正和乡村工作队下乡宣传，回来接到她的信，说有要事奉商，要我马上去见她，但信来已半个多月了。我匆忙赶到她家，原来她母亲要她和一个商人的儿子订婚，她想征求我的意见，得不到我的复信，以为我不理她，就听任母亲摆布，已订了婚。听说她的对象是个二流子，品德很坏。但事情已定，无可挽回，我只有惆怅和她道别。当我接到她结婚的请帖时，我正被组织派往南岳参加游击训练班，途中我把她以前送给我的一张相片并附一首诗寄还她。

数载长相处，一朝未忍离；
恐污战士血，宁作断肠诗。
遥念狂欢日，应知失意时。
谁说莲心苦？无言断藕丝。

我们的关系，从一首诗开始，也从一首诗结束，说来很凑巧。但我很后悔没有争取她出来工作。为这事，我有一段颇长的时间感到内疚。

我到喜泉农校教书，是中大教授介绍的。校长廖迪雍，是电白人，他对我很尊重。但这时抗日已开始，学生要求抗战，不安心学习。我主张对学生引导他们结合抗战学习，不应限制，所以我们利用星期日带领学生下乡宣传。这与校长的见解不同，有时感到不愉快。寒假我照例回到电白搞戏剧宣传。

这里要补叙一下：当我在中大读书期间，电白情况有很大变化，杨竹轩得到余汉谋的支持，回来当县长，谢维屏派已失势。不管那一派当权，受害的只有老百姓。杨的手下有陈作新、何文翰、崔亚基、何伯侯等。这时，陈作新是党务专员，何文翰是县党部书记长，崔亚基是县一中校长。县长陈厉吾，是军队派来的，与何文翰有矛盾。当我

们正在着手演出时，何文翰以县党部名义命令我们停止演出。但县警察局长却支持我们演出，何也无可奈何。原来警察局长是陈县长的亲信，他支持我们是得到陈县长同意的。寒假结束，我准备回喜泉农校教书，但警察局长要我留下来，并通过陈县长介绍我到县一中教书。校长崔亚基本不愿聘请我，但又不敢违反陈县长的命令，只给我很少钟点，以为我嫌钱少会不干。但我不计钱多少，我担任了一个班语文课。陈广杰、严佩琼、李卓儒、邱鸿迪等就是我当时所教的那班学生。

我在一中，一面教书，一面从事戏剧活动。恰好这时唐威回电白任国民兵团副团长（团长由县长兼任），我过去不认识唐，只知道他是十九路军营长，参加过上海抗战。他了解到我在县青年中有一定影响，亲自到我家找我，和我谈抗战工作，并要求我帮助他训练团队，我同意义务担任政治教官，帮他上政治课。我们合作得很好。

学期结束，暑假开始，我们正计划扩大戏剧宣传。县公安局长找我谈话，他说何文翰控告我是共产党，上级有公文来调查我，劝我离开电白，免得惹麻烦。1938年上半年，陈信材和苏觉民等在梅菪创办《南声日报》，我因投稿与他们取得联系。陈信材是大革命时共产党南路的负责人，我早就知道，但未见过面；苏觉民是广州艺协诗歌组成员，是老朋友，他的笔名韩彦。这时，我没地方可去，只好到梅菪去找他们，由他们介绍我参加张炎将军的抗日工作。此后的情况，我已写了《张炎将军在南路》见《广东文史资料》47辑，这里就不多说了。

叶春与『中山剧社』

惊悉叶春同志于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
不幸辞世，万分悲痛。谨作此文，以寄哀思。

刘俊才

一九三二年寒假期间，电白的留省学生叶春、区旭熾、杨学文、高川若、汪鸿谋等回到电城，经过充分研究，认为成立宣传抗日的中山剧社，必须取得合法的手续，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否则就会遭受地方势力的阻挠。当时，谢维屏派主持国民党电白县党部，叶春有个哥哥叶国源是谢派的人。当国民党电白县党部一班执委听到留省学生要成立中山剧社，都认为要叶春当社长才能批准。

回到电城的几位留省学生，经过一番准备，并且得到电白县党部的批准后，电白中山剧社于一九三四年冬在电城东街旧当铺宣告成立。叶春是负责人，剧社宗旨以戏剧方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抗日救国，反对侵略，反对贪官污吏，教育民众热爱祖国，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当时自愿加入剧社的青年有三十多人。

中山剧社成立后，大多数社员利用空闲时间自动地到剧社排练戏剧，学习弹奏乐曲。剧社排练有话剧和粤剧。话剧由区旭熾导演，粤剧由一姓区的社员主持排练。

中山剧社成立时，在电城演出胡适的《终身大事》和日本菊池宽的《父归》，得到了观众的好评。从而增强了社员宣传演出的信心。同时吸收女青年香如兰、杨润珍入社，从此，剧社有了女演员。

一九三五年暑假期间，在叶春的主持下，中山剧社于电城东街国

民党电白县党部对面街上搭起戏台，一连三晚演出反恶霸反封建话剧。演熊佛西揭露土豪劣绅丑恶行径的《屠户》，区旭熾扮演剧中的土豪恶霸。当剧演到高潮时观众竟忘记是演戏，站起来大叫要涌上舞台去打作恶多端的土豪。经过解说这是演戏，才平静下来。这出话剧演过后，不少观众还传诵戏中的台词，可见其影响之大。演话剧《孔雀东南飞》，区旭熾、杨润珍扮演剧中人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这对夫妇感情恩爱，然而焦母欲逼刘氏离开家门，兰芝自誓不嫁，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剧终落幕，观众称好，有不少人还掉了眼泪。

往后，电白县党部换了杨竹轩派的何文翰当县党部书记。诂料中山剧社在一次的演出中，何文翰竟派两人拿他的条子到来责令剧社停止演出。当时，剧社负责人叶春，只得向观众宣布县党部禁止演出的条子令。观众听了十分愤慨，并且质问：宣传抗日有何罪？更甚者，指斥不许宣传抗日就是汉奸。当场高呼“打倒汉奸”口号。在观众中，有一姓林的电白县警察局长，又有一个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将领、任电白县国民兵团副团长，他们都是实力派。警察局长、国民兵团副团长都在场，观众严厉质问为何禁止演出，县党部派来禁止演出的两人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县长陈厉吾与县党部头头因争权夺利、互相攻击，所以出现禁止中山剧社演出抗日话剧的蛮横举动。

这次风波过后，姓林的警察局长常到中山剧社找叶春、区旭熾等谈心。当他知道叶春等是利用假期回乡作宣传抗日演出，假期过后又要赴外地工作，于是要求叶春不要走，要想办法在电城工作。经过林局长的一番周旋，叶春入电白县立中学当教师，高川若入电白县立小学当校长。叶春当电中教师，对在校就读的陈广杰、严佩琼等一班学生，播下了革命种子。

中山剧社核心成员汪鸿谋，是商业家庭子弟，他热心抗日宣传工作，曾捐钱给剧社购置道具，是一位言行一致的进步爱国青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炎将军回到广东南路当第七区专员公署专员，同时成立七区抗日剧团，他的夫人郑坤廉，率领剧团到各县巡回演出。到电白演出时，她知道叶春主持过中山剧社，要求给她支持与帮助。在郑坤廉的要求下，叶春介绍区旭熾入七区抗战团体工作，他自己也顺应抗战时局的需要，应邀入七区专员公署工作。他们离开电白后，中山剧社的演出活动就停止了。

中山剧社从一九三二年成立到一九三八年结束，在这五年中演出不少具有时代气息的戏剧，在反帝反封建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六年夏，叶春同志寄回一九三五年中山剧社的五位负责人合影照片一张，他们是电白留省学生叶春（前中）、区旭熾（前左）、杨学文（前右）、高川若（后左）、汪鸿谋（后右）。这张合影保存了六十一年，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相片。

